

現代技術與臨界的底線

一種基於柏拉圖創世論視角的古今對觀

■ 高山奎

暨南大學哲學所

啟蒙理性主義高歌猛進了四個多世紀，到了本世紀初，人與神的關係（宗教之維）、人與人的關係（倫理、政治關係）似乎變得陳腐過時，與之相對，人與造物（技藝產品）的關係愈加變得凸顯，甚至劍拔弩張。近代啟蒙精神鼓舞下的現代人高揚人本（取代神本）主義和主體性精神，放棄古典自我湧現的旁觀者視野和審慎節制的實踐態度，借助自然科學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自信，赤膊上陣，毫不畏懼地對自然進行認識、征服和改造工程。而到了21世紀，這種態勢愈演愈烈，尤其是在AI工程和基因編輯領域，人們開始將目光從外部自然轉向人類自身，熱衷於加快對人之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問題是，打著醫用和增強旗號的人工智能，在哲學上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到底如何審視這一造作技藝的形上基礎及其後果？本文試圖以古希臘哲學，尤其是柏拉圖的哲學為鏡，嘗試對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等科技理性的根底和現代偏離做出清理，同時對克服它的幾種可能哲學進路做出分析，算是拋磚引玉、

求教於方家。

一、柏拉圖視野中的完美宇宙和天人之際

柏拉圖的宇宙論和自然哲學論述主要集中在《蒂邁歐》中。在這部對話錄中，柏拉圖試圖借助虛擬角色——蒂邁歐之口，向我們闡發他關於宇宙創造、人類產生及其身心關係的基本構想。概括言之，這一構想可概述為如下幾點：

首先，柏拉圖的可感宇宙是由神匠製作出來的。這裡的神匠不同於猶太—基督教言述下的人格神，也不同於當時佔據主潮位置的古希臘諸神。猶太—基督教之人格神的六天創世可謂無中生有，根據《創世記》的描述，上帝沒有模板可理觀，也沒有質料可取用，一句悠然的

「上帝說要有……」，便有了世間萬物（《創世記》第1章）。與之相比，柏拉圖的神匠可沒那麼高能，在蒂邁歐的敘述中，創世之前就已然存在創世的模本（宇宙理型）、創世的材料（水火土氣），甚至

摘要：現代科技理性的古典偏離帶來了重要的古今轉換：祛神，意味著放棄沉思旁觀，主張實踐改造；祛善：意味著技術進步脫離了善好（倫理）和審美（藝術）的規約；祛魂：意味著過於關注肉身安頓，放棄了靈魂的滋養和提升，這直接導致了欲望對理性的造反。概而言之，現代科技昭示給我們的圖景是：上帝已死、善（好）懸置，技術與資本合謀，自利的人們在欲望戰車的驅趕下，走向了集體的非理性和瘋狂。在作者看來，面對現代科技理性的高歌猛進，幾種有益的糾偏進路表現在：海德格爾式的藝術之思，本雅明式的神學政治方案，以及重啟中西傳統秩序化的自然之思。這些哲學進路，並非要徹底反對技術的應用抑或放棄現代生活方式，而是要為科技理性提供底線守護的評判基點和參照標準。

關鍵詞：柏拉圖；《蒂邁歐》；科技理性；宇宙論；海德格爾；本雅明



包括「生成過程的空間載體」(《蒂邁歐》50c-d)。¹⁴換言之，柏拉圖的造物主更像是一個技藝高超的手藝人(工匠、建築師)，而不是後世一神教中無所不能的超越者(上帝)。同樣的，古希臘神話中的諸神也不像一個建築師，而是一個個需要在現實中吃喝拉撒的Superman。在荷馬的筆下，在赫西俄德的諸神譜系中，諸神為七情六欲所主導，其家族繁衍瀰漫著各種暴力、欺騙、嫉妒、情欲、勾心鬥角和權力爭奪，這與柏拉圖筆下不受情欲支配的、沒有嫉妒心的、內心充滿善的、具有高超製作技藝的工匠神判然有別。

其次，神匠為何要創世？在柏拉圖筆下的蒂邁歐看來，創世的根據和動力來源於善。首先造物主是完善而公正的，故而，他「希望萬物盡可能完善而無缺陷」，因此，當他發現可見事物「不穩定、到處亂竄」，就像頑劣而無教養的孩子。¹⁵出於本性的善和仁愛，神匠便想讓世界變得更好一點，所以他按照基礎三角形和幾何立體來型塑微觀質料，按照幾何圓形和合比例數列來創造宏觀世界的星體，並讓它們各安其位、有序運轉。對神匠而言，理性的存在總是優於無理性的存在，有序總是優於無序，因此他用同、異、存在塑造宇宙靈魂，並將靈魂置於生命球體的中心，並擴展到整個宇宙身體，構造了自足自轉的宇宙生命體；同樣的，他讓年輕的諸神如法炮製，構造人的靈魂和身體，並讓靈魂來勸服、控制身體，達到身心和諧；這樣，「秩序引入無序運動中」，從而有了我們所見的完美宇宙和高度符合理性原則的人類產生。(《蒂邁歐》30a, 34b-35a, 69a-77e)總而言之，在柏拉圖看來，工匠神創世的目的和根據來自於善(好)的目的。正是在善好意願的驅動下，神匠以數和理性為創世原則，通過幾何立體形塑水火土氣四種基質材料，為我們製作了合乎數學比例的宇宙生命有機體。

第三，柏拉圖的宇宙有機體是以靈魂為本原的生命有機體，而不是以元素或粒子為基礎的機械複合體。機械複合體包含了一種還原論的傾向，即認為複合物整合而成的宇宙整體以無靈魂的自然元素(如水火土氣)或基本粒子(如原子)為基本單位，依照偶然(不定因)或機械原因(因果關

係)拼構而成。然而，在柏拉圖看來，這樣的思路無法解釋現存宇宙的優美、善好和符合理性(數學比例)。例如，在《斐多》中，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向好友抱怨，按照阿那克薩戈拉的物質主義解釋，我坐在監獄裡等候判決是因為我的肌肉、骨頭、關節和皮膚的如此安放和擺布，這混淆了事情存在的條件和原因。肌肉、骨頭等只是物質條件，沒有物質條件，原因或許不能成其為原因，但把條件作為原因，就混淆了蘇格拉底獄中等候判決的真正原因，這個原因就是，蘇格拉底認為，我坐在這裡是對的，「雅典人判我有罪，而我也認為最好坐在這裡」。(《斐多》98e)¹⁶可見，柏拉圖認為靈魂才是生命(宇宙生命和個體生命)運動變化的最終根據，正是靈魂所認定的好(善)將可感萬物安置成現在這個樣子。與之相應地，人之身體的被造也是符合善因和理性原則，直立身體的構造與理性對情欲的支配高度契合的。

綜上可見，柏拉圖的宇宙論是有神的創世神話，神匠是依據善的目的和理性的原則造作了可感世界，創生了天地萬物，這樣的宇宙是一個有機整體，它以靈魂為本原和根據的生命有機體，物質元素只是宇宙和人之整體的必備條件，而非宇宙和人產生並開始行動的內在原因。這種理性化的創世敘述在形而上學上極大地契合了猶太——基督教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形象，並構成了萊布尼茨式神義論的基礎；在科學上，數學化的宇宙構想深刻地影響了開普勒、牛頓等近代科學的數學化的天文學研究；在政治哲學上，最佳秩序的宇宙構成了最佳政治的範本，成為天—地—人，宇宙—城邦—個體同形同構的基礎。遺憾的是，隨著近代科技的日益強盛，柏拉圖的創世構想及其理性原則因其與經驗科學的抵牾而遭到遺棄，人工智能和基因編輯的出現便是這一貶黜和背離的極端性體現。

二、從柏拉圖的創世神話對觀現代科技的學理根據和形上基礎

理解了柏拉圖宇宙論的動力因、原則和依據，我們便可以很好地理解現代科技對柏拉圖原則的現代偏離。這種偏離表現在如下三點。

首先，現代科技預設了神的缺席和人的自足。柏拉圖的創世論是有神的創世神話，宇宙是神而非人類的偉大作品。在柏拉圖看來，人是宇宙的沉思者和靜觀者，而非自然（包括人性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者。視覺是神給人最好的禮物，因為理論靜觀需要感官視覺，通過仰觀天象，區分晝夜、年、月，獲得有關數和時間的觀念，人類洞悉了宇宙的秘密，獲得哲學認知（《蒂邁歐》47a）。^[4]與之相對，那些祛神的宇宙論學說，在柏拉圖看來，要麼是前蘇格拉底自然哲學，要麼是柏拉圖同時代的原子論學說。前者作為自然元素在形成具體事物時因其惰性而無法實現自足，後者則因為訴諸偶然外因或不定因而無法解釋這個世界的秩序與美好。毋庸置疑，現代科技承接的便是原子論的自然科學思維，在從事科學研究時，他們將上帝的存在懸置起來，對科學自身加以膜拜，試圖依靠人自己的力量對人自身加以改造和完善。問題是，人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洞觀全域，解決所有的問題嗎？缺少神（天）的維度，便意味著沒有敬畏、無須虔敬、沒有限度意識、無須底線禁忌，這種思維或許有助於人的肉體安頓，去無法帶來人類靈魂的安寧。

其次，現代科技技藝否棄了善和理性的創世原則。在柏拉圖的宇宙論中，創世的原因來自於善，即工匠神認為有序優於混沌，理性好於非理性，便用比例和尺度形塑水火土氣四種元素，造作並創生天地萬物。但在現代科技中，技藝的操刀者由神變成了人，科技尋求的目的也不再是倫理善好和審美和諧，而是因果關聯的邏輯可能性。科學因為無法安頓主觀偏好的普遍有效性，便將價值問題懸置起來。然而，一旦脫離了實踐價值的規約，秉持價值中立的科技就成了徹頭徹尾工具或手段。作為手段或工具，它既可以為理性和善說服、為人類的善好增益，也能為激情、欲望所俘獲，借以滿足人類無節制的本能衝動。放棄了善好的原則，欲望的造反便有了可乘之機，理性變成了欲望的奴僕，轉變為工具性的計算理性，這為資本的肆無忌憚提供了舞台。量磨平了質的差異，一切底線、善好、美醜等質的規定性都在數量的資本面前被拉平。技術更是拜倒在資本的石榴裙下，二

者聯姻苟合、狼狽為奸：資本為技術應用提供平台和動力，技術為資本的增值插上了翅膀。可以設想，在技術和資本強強聯合的背景下，基因定制如果像商品一樣流行起來，那麼，階層間的馬太效應將會立顯：通過編輯基因改良後代，將導致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簡而言之，人工智能昭示給我們的圖景是：上帝已死、善好懸置，技術和資本的苟合聯姻，自利的人們被欲望的戰車驅趕著，走向集體的瘋狂和非理性。

最後，現代科技更加看重質料（物質）而非靈魂動因。對於技術專家而言，基因（基礎原因）附載著人類生命的原始密碼。這一理論的著力點，意在取代機械論的整體觀，重回生命的有機體的理論來理解人的存在。但基因的歸因方式仍然強調生命本原的物質層面：基因可以剪輯修改便預設了它具有廣延性，既具有物質性的空間維度。也就是說，基因工程的形上根基便是將物質而非靈魂作為理解生命的基本原則。我們當然承認，人的存在離不開物質性的基因基礎，但真正的全人卻在於靈魂的卓越。為了這種卓越，柏拉圖試圖通過教育來實現靈魂轉向，從洞穴上升，從而呵護和滋養人的德性。基因專家們則直接訴諸於對人的基因進行剪輯，希望直接提升人的品質。這種做法捨本逐末，將人類拖入不可測的不定因的風險之中。我們的時代太過於關注身體的舒適與安逸，而鮮有關注靈魂的滋養和安頓。這種反柏拉圖式頭腳倒立的身姿構造和欲望居上，為消費主義和倫理越界敞開了大門。毫不誇張地講，現代以來的生物工程領域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以突破底線和僭越倫常為代價的。我們的科技專家們放棄了有機聯繫的整體（宇宙論）視角，而是著眼於功能細節和功利目標，試圖不計任何技術風險和倫常後果，盲目地堅信自己的理性可以解決一切、征服一切，哪怕更改人的自然和人的生產本身。這種理性萬能的樂觀主義，無疑是啟蒙運動的直接結果。

綜上可見，柏拉圖與現代技術專家在有神論與無神論，善好與不定因，靈魂與質料，有機整體與功能細節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原則分歧。祛神，意味著放棄沉思旁觀，主張實踐改造人與自然；



祛善：意味著技術創制脫離了善好（倫理）和審美（藝術）的規制；祛魂：意味著過於關注肉身安頓，放棄靈魂滋養和提升，這直接導致了欲望對理性的造反。以柏拉圖為參照，科技進步的古典偏離一覽無餘：我們的科技專家們不再堅信這個世界是製作精良的完善之物，不再篤信人體構造是高度理性的完美藝術品。他們把上帝的存在遺棄或懸置起來，試圖借助人類自己的力量（科技力量）去修補人的缺陷，去馴服自然為人所用，去編輯基因來提升人的品質。在這樣的邏輯下，啟蒙變成了神話，科學變成了利器，人成了新的上帝。這種實踐觀根底裡包含的進步信念和狂妄衝動，最終滌除了對神聖自然的敬畏意識，拋棄了有機聯繫的整體觀念，放棄了對道德底線和善好目的的堅守，無質的量與價值中立的技術最終苟合聯姻。以這樣的觀念為指導，我們何來勇氣自我安慰：希冀基因工程對人類來說或許不是災難，而是一種福音。

三、應對現代科技狂飆突進的三種哲學進路

面對科技理性的肆無忌憚，以及技術與資本的強強聯合，我們僅是認清它的真實面目並不足夠，還要提供可行的應對方案。一般而言，對待科學技術，或者往大了說，對待現代性危機，哲學家的態度或是悲觀、或是樂觀，在應對方略上也往往採取兩條不同進路，即或是向前走，如後現代主義，或是回頭看，如回歸中西古典傳統。

顯而易見，本文論題的古今對堪便預設了筆者回頭看的古典哲學進路。換言之，在筆者看來，回到古典等級秩序的自然正當和有限理性原則，是應對現代理性僭越與狂妄的最具明智意義的學理方略。而這一路徑的展開，一方面通過修習古典巨作，對堪現代的極端偏離，從而查找現代性諸種危機的病症根源；另一方面，通過誦讀詮釋古代經典，滋養被欲望權利扭曲了的現代靈魂，警惕現代唯科技馬首是瞻的意識形態觀念，拉開與科技產品的個人距離。但問題是，我們真的能夠刹住狂飆突進中的現代性列車，讓被現代靈魂觀和科技產品嬌寵慣了的身心發生偏好轉向，進而回返到

古典虔敬和節制的禁欲主義生活方式之中？簡言之，我們真的能夠回到古代？如果不能夠，那麼作為中國人，我們還有沒有重返西方古典之外的學理資源可資利用？在筆者看來，如下三條解決方略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首先是藝術的解決方案。在古希臘哲學那裡，技術和藝術統稱技藝，同屬與實踐相對立的創制範疇。但在海德格爾那裡，技術和藝術成為領會存在的兩種不同進路，兩者的區別表現在藝術的本質是「存在者之存在」的開啟，「亦即真理之生發」，^[5]例如梵高的油畫農鞋，作為一個藝術品，它敞開了農夫的整個世界和全部生活的艱辛。而技術是對象化的思維方式，它對有用性的強調，使得農鞋變成了一個器具性的存在，在工具化的使用中，農鞋喪失了與農夫相關聯的整個世界。對海德格爾而言，藝術敞開了本真性的生命存在，使得尋常之物變得與眾不同；而科學技術關注的是「變化中前後相繼的恆常和必然」，試圖使「每一過程的每一階段都變成可計算的和可掌控的」。「在技術的魔咒之下，我們就會盲目地追求一切能被設計和計算的東西。」^[6]因此，人要想擺脫技術的宰製，在海德格爾看來，就要把技術「當做藝術的衍生物」，讓它對藝術保持敞開。否則，受制於技術的操控，藝術就變成了「訂購的供應」，變成一種商品目錄中待售的體驗，也就無法敞開人的本真性生存和美的真理。^[7]通過訴諸詩歌和藝術，晚期海德格爾力圖應對「大地在精神上的淪落」：「世界趨於灰暗、諸神的逃遁、大地的毀滅，人類的群眾化」。儘管他帶有悲觀意味地多次重申，「唯有神的干預才能讓技術發展的競賽止步」，但他對藝術與技術對堪的理解確實為個體化的抗擊技術操控提供了可貴的嘗試。^[8]

其次是神學——政治的方案。這主要體現在本雅明的思想當中。1940年初，面對密不透風的黑暗，尤其是受到《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觸發，本雅明書寫了遺作——《歷史哲學論綱》。在這篇札記性的天才寫作中，本雅明質疑了以線性時間、因果關聯和進步主義作為正當性根據的歷史主義學說，在他看來，要想打破歷史的連續統一體，需要革命的抗爭和當下的爆破，因為「日曆並不像鐘錶

那樣計量時間，而是一座歷史意識的紀念碑」，「偉大的革命引進了一個新的年曆」，歷史唯物主義為這一革命爆破提供了外在契機，一旦歷史連續統一的外殼被打開缺口，「時間的分分秒秒都可能是彌賽亞側身步入的門洞」。^[9]可以看出，面對技術進步和歷史主義共同織就的極權主義世界，本雅明希望借助神學——政治的方式加以解決。這裡的神學，是神秘主義的猶太教哲學，政治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革命政治。在本雅明看來，表面上看，歷史唯物主義要實現塵世的解放和自我救贖，但究其根本，它不過是一個提線木偶，神秘的上帝就像一個「棋藝高超的侏儒」，躲在遊戲機裡，「通過線繩操縱木偶」，借助木偶的行為實現他（上帝）的自我意志。^[10]也就是說，現代技術世界之極權統治的摧毀，既需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因為「沒有這種粗俗的、物的東西，神聖的、精神的東西就無法存在」；^[11]也需要作為末日審判者的上帝意志。因此，馬克思主義（作為手段）與彌賽亞主義（作為目標）的奇特組合構成了本雅明直面當代技術世界的最後心理依托。

最後，重返中國傳統親情倫理。毫無疑問，海德格爾哲學式的藝術進路和本雅明政治化的神學方案，直面的是20世紀的機械技術與極權政治，作為高度敏感和睿智的哲人，儘管他們的方案直接針對啟蒙的現代理性主義的自我背反，但他們都未能洞見到當下漸成風潮的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作為中國人，我們是否有自己的學術資源借以對抗基因工程或科技理性的挑戰。根據前述，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預設了狹隘的靈魂觀，如人工智能，只是模擬強調了人的理性邏輯運算的一面，如基因工程，突出強調了人的物質基礎的改良。對於前者，在中國這樣一個注重血緣親情的社會，人性的標準就是人的感性而非理性的一面，一個沒有感情的理性人冷酷而薄情，並不受傳統中國文化的推重；對於後者，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生養和孝道，基因工程帶來的倫理悖論是，到底孩子的真正原因是髮膚父母，還是來自技術專家的改造。如果基因編輯在資本的護佑下得到風行，那麼，數代後的孩子不禁疑惑，他的良好基因是來自家族的優

良基因還是基因剪輯後的連鎖反應。生的原因都受到質疑，那麼養的合法性又如何維護。對於中國人，我們或許沒有猶太裔哲人本雅明的神學依托，也沒有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藝術（詩學）觸悟，但我們有自己的血親傳統和倫理觀念，而這些觀念恰恰沒有受到過西方現代性的洗禮和污染。換而言之，我們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因為它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靈魂內核（根），也是我們檢省科技理性、馴服量化邏輯宰製的可貴資源。總而言之，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或許是應對現代中國科技理性主義的一個重要契機，儘管當下它的真正效用尚未開始顯現。

小結

海德格爾在1935年夏季學期的講課稿修訂出版的一本書中，曾寫下如下一段話：如今的歐羅巴，還蒙在鼓裡，全然不知它正處在「千軍一發、岌岌可危的境地。如今，它遭遇來自俄國和美國的巨大的兩面夾擊，就形而上的方面來看，俄國與美國二者其實是相同的，即相同的發了狂一般的運作技術和相同的肆無忌憚的民眾組織。如果有一天技術和經濟開發征服了地球上最後一個角落……這個問題仍會凸顯出來，即：為了什麼？走向哪裡？還幹什麼？」^[12]這段話的含義極其豐富，單就一方面而論，海德格爾深刻看到了俄國和美國的一致，這種一致就是都是現代國家，更準確地講，都是現代的技術國家。在技術面前，意識形態的勢不兩立其實已經無關緊要。換言之，海德格爾看到，我們之所以會對技術的進步悲觀絕望，是因為技術受到了現代國家的庇護。現代國家為什麼如此熱衷技術？因為，國家可以利用技術更好地對內規訓公民、對外打擊敵人，例如：互聯網技術可以讓國家更好地24小時無間斷地監視（監控）他的公民，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讓民眾只是知道國家想讓他或她知道的信息，進而讓治下公民成為單向度甚至無思的人；核技術、衛星遙感技術可以讓國家更好地消滅敵人，實現軍事威脅以達到經濟最大化原則；生物基因技術可以讓國家更好地設計並製造出符合其要求和偏好的人民……換言之，如果修昔底德陷阱存在正當性的話，在（軍



事和科技)技術競賽面前,有哪一個國家會冷漠靜觀,坐視其他國家發展技術?

如果說國家的支持,使得技術變成了一個power的問題、政治的問題,那麼,資本的介入,使得技術又變成了無孔不入的利益問題或靈魂秩序(欲望)問題。就基因工程而言,在強大的經濟利潤面前,有哪一個醫藥公司、哪一個高新企業會對此無動於衷。人們都想長生、長壽,這一欲望使得人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實現這一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發生是遲早發生的事,只不過它發生在哪個國家、哪個人身上具有高度的偶然性。由於資本總是要尋求增值的,而技術為資本增值提供最大限度的可能,那麼,資本也就沒有理由不鼓勵、不支持、不推動技術創新和技術發展,谷歌公司高調宣布要和基因公司合作研發藥物,實現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的結合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1]有資本推動的技術創新,有國家支持(未必是主動,但會默許)的技術發展,讓很多人文知識分子倍感絕望。但我們也可喜的看到,基因編輯嬰兒發生後,隨著各界的普遍介入,導致輿論方向的突轉。這提示我們,面對技術的肆虐侵襲,我們人類的前景或許不是無藥可救的。我們人文學者的發聲,或許真的微弱無力,或許只是隔靴搔癢,但我們仍可提供科學技術之外的倫理、法律或哲學思考,這不僅能為技術專家提個醒兒,更是讓公眾獲得另一種思路的信息來源。否則讓輿論的聲音完全被科技專家,尤其是資本操縱的專家控制,如轉基因事件所長期呈現的樣態那樣,不僅誤人誤己,而且貽害後人。這就是本文寫作的初衷之所在。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資助項目(項目編號:21PJC095)階段性成果。

[1] Plato, *Timaeus*,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New York: Bolingen Foundation, 1961, p.1177.

[2] *ibid.*, p.1162.

[3] Plato, *Phaedo*, translated by Hugh Tredennick, 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New York: Bolingen Foundation, 1961, p.80.

[4] Plato, *Timaeus*,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New York: Bolingen Foundation, 1961, pp.1174-1175.

[5] 海德格爾、孫周興譯:〈藝術作品的本原〉,載於《林中路》(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5、27頁。

[6] 多羅西婭·弗雷德、劉佳琪譯:〈海德格爾論藝術作品和技術作品〉,載於《柏拉圖的〈蒂邁歐〉:宇宙論、理性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59、165頁。

[7] 羅西婭·弗雷德、劉佳琪譯:〈海德格爾論藝術作品和技術作品〉,載於《柏拉圖的〈蒂邁歐〉:宇宙論、理性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64、169頁。同時參見海德格爾、孫周興譯:〈世界圖像的時代〉,《林中路》(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83頁。

[8] 海德格爾,熊偉、王慶節譯:《形而上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8頁。

[9] 本雅明、張旭東譯、阿倫特編:〈歷史哲學論綱〉,載於《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274、276頁。

[10] 同上,第265頁。

[11] 同注[9],第266頁。

[12] 同注[8],第38頁。

[13] 「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的結合=長生不老?谷歌可能馬上要實現了!」,網址:http://www.sohu.com/a/214135873_710928,原發時間:2018-01-02,上網時間:2018年12月16日。

Modern Technology and Philosophical Basic

Shankui Gao(Jin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bstract: Moder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for example, no god means practice instead of meditation; no goodness means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ree from valuation; no soul means the rebellion of desire against reason.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ques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reason, they are Heidegger's artistic thinking, Benjamin's theological-political project and return to nature righ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These strategies are not to completely oppose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or give up the modern lifestyle, but to provid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Key Words: Plato, *Timaeus*, Gene-editing infant, Cosmology, Heidegger, Benjamin